

『中国的希望正在此』 美亚小组延安行

□袁剑

1936年“美亚”小组访问延安，成为包括拉铁摩尔在内的西方知识界更全面地认识共产党，进而更好地认识当时中国政治与亚太局势的一个重要契机。拉铁摩尔本人，则充分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民族与国家危亡之际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并在海外中国研究界产生深远影响。

1936年“美亚”小组奔赴延安

拉铁摩尔的延安之行，既有机缘巧合，更是时代契机。1936年，美国《美亚》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偕妻子艾格尼丝·贾菲，以及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来到北平，跟当时在此供职的拉铁摩尔有了初步的交往。为获得第一手新闻素材，他们想去红色圣地——延安看看，由于拉铁摩尔是个“中国通”，便邀请他作为向导和翻译同行。因此他们后来也被称为“美亚”小组。

在稍作准备之后，他们于1936年6月7日从北平出发。为顺利到达延安，他们颇费了一番周折。6月10日，他们一行抵达西安，并获得了允准访问延安的介绍信，但如何前往，必须自己想办法。这时，他们幸运地找到了在中国土生土长的瑞典人埃菲·希尔，他是位出色的汽车修理工，说一口非常流利的中文，在西安开了一家商行，主营汽车出租和维修业务。他们一拍即合，共同奔赴延安。

当时，从国统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依然风险重重。6月18日，“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们全都挤进了他的汽车。我们没有退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车子出了城门后，便一直朝前开，到了西安部队与红军之间的一个边界哨所。由于这个瑞典人是本地人，知道在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因此我们毫无困难地通过了哨卡。”虽然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说得轻松，但实际行程依然艰险。由于连日大雨，水位猛涨，他们涉水绕路，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完了三百公里的行程。

6月21日，拉铁摩尔一行五人最终抵达陕北延安。从时间上看，他们是进入陕北根据地的第七批美国友人，也是抗战全面爆发前最后一批访问中共领袖和红军将士的外国人。他们在这里一共待了四天，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等人得以深入了解和认识生活于此的中国共产党人，并发现了中国复兴和崛起的希望。

拉铁摩尔眼中的毛泽东

抵达延安的当晚，拉铁摩尔一行就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人前来慰问，并为他们举行了临时欢迎晚会。次日上午，他们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观摩朱德授课。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住处会见了他们，详细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对英美

尔后来回忆道：“尽管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主席，却以最坦率的态度谈了。他们具有惊人明晰的头脑，预言了战争的爆发、演变和结果，以及战争对国共两党围绕着爱国抗战的领导权进行的斗争的影响。”

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到：“令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词，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拉铁摩尔的判断十分敏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所作出的努力与牺牲，通过国内外媒介的报道而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

当天晚上，毛泽东等人陪同他们观看了文艺表演。“在延安，晚上他们举办文艺娘性的集会。大人物们，毛、周、朱和其他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坐在观众中间，他们没有特权者的席位，完全同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他们了解人民想法的重要手段之一。”这种场景，对拉铁摩尔触动很大，跟他在上海、北平等地所见景象完全不一样。

采访朱德、周恩来等人

他们到延安的第三天上午下起了大雨，原来约定的篮球友谊赛被迫取消，拉铁摩尔一行改为采访朱德。朱德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国内军事形势以及抗日战争的军事战略等问题。下午，他们拜访博古，从他那里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当晚，拉铁摩尔一行终于有机会拜访周恩来，并进行深入交谈，内容涉及国际战争的军事战略等问题。毕恩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周恩来愿意并且希望把事实告诉我们，甚至对一些尚未解决的敏感问题，也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详细情况。”拉铁摩尔对于这次拜访同样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也是那个时候。后来，从一九四一年到四二年，当时他是驻重庆的正式党代表，我是罗斯福总统指定的蒋介石的政治顾问，那时，我和他成了知己朋友。”

24日上午，他们受邀在朱德主持的红军指战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听众两千余人，大多数是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贾菲、毕恩来和拉铁摩尔轮流发言，反响强烈。之后，毕恩来、贾菲等人在朱德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延安的中央党校等机构，拉铁摩尔本人则采访了几位少数民族人士，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团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当天傍晚，他们一行结束对延安的访问，启程返回西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专门为他们送行。在延安之旅结束后不到两周，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抗战全面打响，国内外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现中国的希望

要是没有延安之旅，拉铁摩尔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的认识将是不完整的，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也是缺失的，因为在这里，蕴含着后来被证明是变革中国的决定性力量。延安之旅使拉铁摩尔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曾经被误解和掩盖了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蓬勃生发：“有天，在回西安的路上，当我们等待汽车发动机冷却下来时，我问希尔：‘埃菲，你见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你认为这些人怎样？’因为他任延安四处走动，跟人们攀谈过，我想听听他的反应。他说：‘告诉你吧。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可以说，中国的希望正在此。

历史也印证了拉铁摩尔等人的判断。正是从这里出发，中国共产党人经由全民族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并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到了1972年，受周恩来总理邀请，曾经饱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迫远走英伦的拉铁摩尔，在古稀之际，再度踏上阔别二十余年的中国大地，得以重新认识这个迈向兴盛与富强的东方大国，并亲自感受这个希望在未来的进一步盛放。



追寻信仰 弦歌救亡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殉难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张立

马列指航，逐鹿华中，誓扫天狼。鲁艺战友，荟萃串场，鲁迅精神，光大发扬。唤起民众，弦歌救亡，前赴后继，慷慨激昂。壮志未酬，饮恨吾乡，江海悲恸，大地低昂。春雷动地，虹彩辉煌，山海竞秀，人间沧桑。蓝图卷卷，史诗行行，经久不息，虎跃龙骧。展望前程，心潮逐浪，英名永垂，日月齐光。

一九八四年九月

碑文全文 500 余字，直抒胸臆，读来令人慷慨激昂，荡气回肠，陡然升起浩然之气。殉难师生追随信仰、投身革命的信念执着而坚定，他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气节令人敬仰，他们纯粹而慷慨，像闪耀的群星，照亮着中华民族的天空。碑文同时记载着 79 年前的那场战斗。

这是一场绝地求生突围。华中鲁艺师生突围伊始便遭遇了日伪军，有备而来的敌人看到手无寸铁的师生，兴奋地嗷嗷乱叫，迅速收紧了包围圈。许晴、丘东平等研究决定：组织师生向东南方转移，他俩与战斗班负责掩护。在场的同志力劝许晴随第一批师生突围，许晴拒绝并反问道：“我是指挥员，你说我能先撤吗？”这位刚满 30 岁的共产党员、戏剧家选择了向死而生，他临危不乱、指挥调度，不幸牺牲。丘东平前后照应组织突围，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以身殉国，年仅 31 岁。学生党员袁万华奋不顾身，毫不畏惧，挥臂高呼为师生指引方向，不料引来枪弹，献出了 19 岁的生命。

这是一群信仰坚定的师生。戏剧系学生徐辉拖着一条重伤难行的腿，被敌人逼到河边，由于担心他身藏炸弹，敌人一时未敢上前抓捕，不愿做俘虏的徐辉用尽力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罢，纵身跃入河中，从容就义。女学生宋莹，为不受侮辱，泡在河水里不肯上岸，被凶残的敌人用刺刀猛刺头部，壮烈牺牲。还有几名女生遭日军追逼至河边，为避免玷污，毅然投河殉国，成就悲壮的“九女投河”。据统计，殉难的学

生中年龄最大的 27 岁，最小的只有 16 岁。这惨烈的牺牲令大地震颤，江河动容！

事件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出于安全考虑，将华中鲁艺师生编入部队，组建鲁迅艺术工作团继续进行文艺工作。《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带着无限痛惜发文悼念殉难师生，抗议日军暴行。陈毅悲愤地写道：“……又如丘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诤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碑铭表达了对殉难师生真挚的缅怀。华中鲁艺师生的殉难使“江海悲恸，大地低昂”，师生慷慨赴死的豪情感动了当地百姓。逢年过节，附近村民便备上供果，去墓前祭奠英灵。为表达对殉难师生的怀念，当年的“北秦庄”改名为“东平村”，战斗的小桥命名为“东平桥”。今日的烈士陵园也成为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场所，向后来人讲述华中鲁艺师生信念坚定、英勇不屈的事迹。

碑铭赞扬了华中鲁艺师生的英雄品质。华中鲁艺师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铁军”，他们带着满腔热血，追寻“马列指航”的光明道路，他们许下“誓扫天狼”的铮铮誓言，决心靠文章“唤起民众”，以“弦歌救亡”国家，他们携手并肩，“前赴后继，慷慨激昂”，积极开展“民运”，践行初心和誓言，但却在那个夏夜“壮志未酬”，饮恨他乡，把青春和身影定格在这里。师生们“英名永垂，日月齐光”！追寻信仰的道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的陈望道

□吴伟华 金战新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译本出版之时，正值新文化运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各类伪社会主义三次大论战之际，陈望道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起，以《新青年》《觉悟》为平台，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假社会主义的本质。而译本的传播，在提高先进知识分子理论能力的同时，更帮助他们明辨是非、认清敌友，在“要不要马克思主义，选择什么样的主义”的问题上加快了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决裂。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著作》，将 1840 年代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复古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类，逐一进行抨击，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极具理论价值。也正是通过对译本的学习研究和这几场论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清醒地看到，要改变中国命运，唯一出路就是向苏俄学习，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从而在与各类形形色色的伪社会主义学说分道扬镳上更加清醒坚决，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一条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更加坚定自觉。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0 年 8 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1 月，上海发起组模仿《共产党宣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宣言两千多字，基本沿用《共产党宣言》的体例，转述和阐释了《共产

党宣言》的主要思想。李达曾回忆宣言草稿前半部分“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尤其是宣言第一次明确亮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宣告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表明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新型政党已经孕育成熟并即将诞生。陈独秀还给北京、武汉、长沙、济南等地寄信，要求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并寄上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的中译本出于上海，有组织上的权威性；用白话文翻译，语言简洁优美，阅读更为便捷。中译本在全国各地的流传，极大地提高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和理论素养，对促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对中共正式建党起到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作用。

为中国革命快速发展夯实了人才支撑。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先后走上革命道路，从具备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都和《共产党宣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紧密相关。1936 年下半年，毛泽东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在回答自己是如何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周恩来在与斯诺谈话时说，“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



路上充满未知，但华中鲁艺师生用生命为亿万国人带来了动人心魄的“英雄气息”。

碑铭体现了文艺凝聚群众力量的价值。抗战最艰难之时，中华大地长夜如晦，文化艺术的价值遭遇冷落，中国共产党却坚持“艺术——戏剧、音乐、美术等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有力的武器”，于是“鲁艺”应运而生。一句“鲁艺战友，荟萃串场，鲁迅精神，光大发扬”，深刻表明华中鲁艺师生传承和发扬的是革命文艺精神。1941 年 6 月初，成立不到半年的华中鲁艺师生便深入各地农村，一边帮助百姓夏收，一边开展抗战宣传。他们不知疲倦，积极创作反投降、反“扫荡”、减租减息、参军报国、统一战线等内容的版画、漫画、标语、口号，进村串户，宣传抗战必胜的信念，动员了近 2000 名农民参加自卫队或新四军，充分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文艺释放的蓬勃力量。



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1920 年夏秋之际，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并由陈望道亲自讲授。事后刘少奇回顾这段经历：“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而陈望道也在翻译和传播《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进一步完成了世界观和政治信仰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传播、中国工人运动启蒙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组织者。1920 年 5 月，他与陈独秀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 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诞生，陈望道是 8 位成员之一；他还陆续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及其他文章，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宣传。1921 年，陈望道作为上海地区选举出来的一大代表，积极参与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参加中共一大，但一大后仍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上海地方党务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这一切，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的突出地位。

